

易地移民邻县安置的意愿、期望与社会适应性

邵秀军¹ 咎欣²

(1.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临汾 041000;

2.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已有关于易地移民安置的研究重点关注了非自愿移民的“远迁”安置方式, 并认为移民在迁入地不能适应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在新迁入地的人力资本失灵和社会联系中断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将关注焦点放在了易地移民的“邻县安置”类型, 细化测量了易地移民的安置意愿, 使用心理学的期望确认理论分析了移民在搬迁前的心理预期对搬迁后生活、生产方面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提出了易地移民邻县安置的社会适应模型, 使用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研究发现, 在易地移民邻县安置方式中, 移民的搬迁意愿是影响其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 而搬迁前的期望和搬迁后的心理确认在这一因果链条中有中介效应。

关键词: 生态移民; 社会适应; 期望值

DOI: 10.14120/j.cnki.cn11-5057/f.2019.11.023

引言

易地移民的“邻县安置”是我国政府在生态移民、工程移民上经常使用的一种安置方式, 是指移民的新安置区在原迁出地相邻的另一个县(区), 迁入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但生产生活等社会文化差异较小。这种类型的移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生态移民中比较常见。2001—2007年, 国家实施宁夏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 在宁夏红寺堡扬黄灌区、固海扩灌区等地建设移民安置点 31 个, 主要为了安置泾源县、隆德县、西吉县、同心县等跨县生态移民^[1]。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心理背景相似, 社会文化及传统习俗易于被移民接受, 特别是回族移民独有的生活习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类型的安置方式具有能使移民尽快适应迁入地的经济与文化的优点, 但目前学术界对这类移民安置方式的研究还较少涉及。

目前, 关于易地移民安置的大量研究主要聚焦在“非自愿移民”的“远迁”类型。在因工程建设、生态建设等大型工程引起的非自愿移民的研究中, 著名水库移民专家 Cernea^[2]指出, 非自愿移民存在着 8 个方面的风险, 并认为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 能否恰当解决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问题是移民工程成败的关键。目前, 大量学者认为, 移民的社会适应与移民的人力资本有关^[3-6]。若人力资本较高, 就能较好地掌握生存技能并消除不良心理; 若原迁出地的工作技能不能满足迁入地的工作需求, 导致移民不能适应迁入地的生产生活, 有学者称为“人力资本失灵”^[7-10]。Kar 和 Takeuchi^[11]的研究发现, 搬迁前以放牧为生的移民在搬迁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和经验, 且教育水平低下, 无法参与当地政府开展的各项技能培训, 很容易陷入返迁或生计贫困的风险当中。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始从移民的社会资本角度探讨非自愿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问题。若移民在搬迁后能获得生计转型、资金支持等实质性帮助, 获得有利的发展机会和有价值的信息, 移民就能更好地适应安置地的环境^[12-15]。

实际上, Cernea^[2]及后来学者们的实证研究所指的移民在搬迁后会出现“边缘化”或在生产生活中不能适应迁入地社会的问题, 更多的是指那些迁移距离较远以致“出”“入”两地出现了较大的文化差异。在环境剧变的情况下,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会失灵, 拥有较大社会网络的移民在家庭经济恢复方面也不可能发挥预期的效果^[16]。政府即便给予移民一定的职业培训, 但也加重了同水平移民的竞争, 使得即便拥有工作的移民也拿不到较高的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仍旧贫困。

收稿日期: 2017-0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MZ094); 山西省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2016&19); 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2017-77)。

作者简介: 邵秀军,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咎欣,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然而,近年来在中国,除了像三峡工程那样大规模的跨文化移民,大部分都是“后靠”型移民、县内移民、甚至村内移民(从山上到山下)或其他类似“邻县”安置的近距离移民。这类移民搬迁后,生产、生活、文化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社会关系也没有太多中断,但近年来的研究却仍然发现,这类移民到迁入地后仍有较多的社会不适应。如陈金明和吴淑娴^[17]、束锡红等^[18]发现,移民在就近安置时,不同搬迁意愿、期望及年龄阶层上的不同群体,社会适应差别较大。因此,在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中,除了生计资本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或者说目前的研究尚未发现资本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完整机制^[5,19]。

近年来,在对中国拆迁户的研究中发现,拆迁户的搬迁意愿、对搬迁补偿的期望与安置满意度显著相关^[20]。金细簪等^[21]发现,人们对拆迁的抵制可能来源于过高的政策预期,人们在抵制中表达出的诉求有可能是人们对征地拆迁带来巨大利益强烈期待的结果。目前,随着城镇土地的快速增值和国家拆迁补偿力度的增加,移民户对搬迁补偿及搬迁后美好生活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同时,未搬迁移民户看到已搬迁移民户居住在漂亮的小区并发生了较大的生活变化时,对搬迁后享有美好生活的期望增加。如果搬迁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时,他们对移民政策的满意度会显著降低^[22-24]。移民的期望除了直接作用于移民自身的心理情况外,还可能间接影响后续生产、生活的适应情况,使得期望与现实的不平衡性和移民社会适应及融合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25,26]。由此可以推断,移民的搬迁意愿很有可能是影响“短距离、单文化圈”移民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而对利益的期望很有可能是这一因果链条的中介变量。

然而,关于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目前仍较多集中在“远迁”移民因跨文化产生的社会不适应,对近年来民众在土地补偿、房屋拆迁上的政策期望心理变化还较少关注,但这一点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却越来越重要^[27-30],类似的研究在有关移民的文献中还很少看到。

本文选择邻县安置的易地移民类型可以排除因搬迁导致的文化冲击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作用,着重分析移民的迁移意愿、搬迁后的期望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是对 Cernea^[2]及之后学者们移民社会适应文献的有益补充。

模 型

1、影响因素分析

(1) 移民搬迁意愿

依据移民的搬迁意愿,学者们把移民划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大量研究认为,非自愿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强行改变,移民心理上感到了被剥夺,生计恢复面临风险^[31-33]。而自愿移民并没出现非自愿移民那样的被剥夺感,他们有更好的生计恢复能力^[34]、较高的满意度^[35]和资本恢复程度^[36]。也就是说越希望搬迁的人,越倾向于克服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困难,社会适应能力越强。但也有研究认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类移民在收入获取、社会适应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37]。如杜发春^[35]、Brooke 和 Mark^[37]认为,自愿和不自愿搬迁并不是决定移民生计恢复的主要因素,移民的资本禀赋、当地政府实施的扶持政策才是影响移民生计恢复和社会适应的最关键因素。

由于易地移民邻县安置是近距离搬迁,迁“出”“入”地社会环境差异不大,人们的风俗习惯基本相同。移民搬迁后可以保持原有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移民更愿意“自愿搬迁”。但部分搬迁移民依旧面临生活方式、社会网络的重构问题^[38]。移民在心理上也会认为自己为移民工程做出了重大牺牲,有“需要补偿”的意识,将政府的财政补贴、项目扶持视为理所当然^[39]。政府政策的实施进程、移民社区的构建进程是影响移民搬迁意愿的重要因素。

(2) 移民对搬迁后的期望确认

期望确认理论是 Oliver^[40]在 1980 年提出的,这一理论描述了消费者购买后的满意度以及购买者再次购买意向受购买前对某商品前的预期、购买后的感知效果、期望与效果之间确认程度的影响关系。最初,这一理论主要针对消费者所提出,之后学者们逐渐将其应用到网络课程学习、体育锻炼、老年人计算机学习等行为之中。

就易地移民而言,他们的期望确认主要是搬迁前的期望与搬迁后的现实相比较得出的心理上的落差,差距比较大时,会出现原有的期望不能确认、进而产生失望、抱怨的一种心理现象。此时,尽管政府在移民搬迁

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移民的满意度仍较低。

易地移民邻县安置是就近的安置方式,移民搬迁前对于邻县的生活环境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和期望值。政府在搬迁前给予移民的承诺可以被移民亲眼观察到,移民会认为搬迁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享有与邻县相同的经济补贴和相似的经济水平^[41]。政府如果能完全有效地履行承诺(足额发放补贴等)会增加移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反之,如果政策执行存在纰漏,搬迁给移民带来经济和生活损失的同时,也使得移民在精神上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精神焦虑,就会影响他们对于搬迁的期待值^[42]。

(3) 移民的生计资本

生计资本是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贫困农户生计的学者们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贫困农户家庭所有资本禀赋的总称,主要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大类资本,是贫困农户从事生计活动,发展生计的基础。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成为研究农户生计活动的重要分析工具^[43]。

如图 1 所示,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核心是生计资本禀赋^[44],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将这一框架应用在贫困农户^[36]、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工程移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生计分析中,以及部分公共政策评估上,可以分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决定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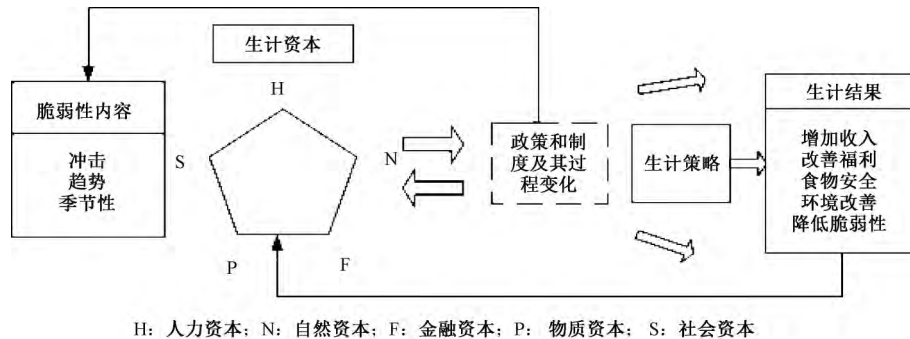


图 1 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近年来,许多研究水库移民、工程移民的学者从生计资本的视角发现影响移民搬迁后社会适应的主要资本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部分移民在搬迁后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原有的人力资本等技能不能发挥作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社会适应差^[41];移民的社会资本则能使移民在寻找新的工作、学习新的技能等方面得到有价值的帮助,还可以帮助移民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安置地的生活^[38]。

就邻县安置的移民来说,除土地等自然资本外,搬迁前后移民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变化不大,生产、生活方式相似,搬迁前整体经济水平不高。移民生活技能的提升,自身潜力的激发,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效实现,成为改善移民搬迁后生活水平的关键^[38,44]。

2、模型与假设的提出

在已有研究中,移民的生计资本对于移民搬迁后的生计恢复有重要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本损失、人力资本失灵、社会资本重构是移民搬迁后贫困、不能适应的主要因素。

另外,在本文的分析中,移民的搬迁意愿和期望确认是影响“邻县安置”型移民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这类移民会在搬迁前根据自己听到的(政府承诺)、看到的(已搬迁户住上了漂亮整齐的新房屋)情况,对搬迁后未来生活产生较高的期望,邻县经济水平的视觉冲击使移民拥有较高搬迁期待,甚至高于政策所能达到的水平。当搬迁后,如果实际困难发生,移民丧失土地、失去了公共财物权利和服务等。缺乏心理准备的移民感到原有预期不能得到确认,加之自身劳动技能失灵,现实经济情况制约,导致移民对于搬迁产生不满情绪,如果困难继续扩大到他们的生计能力难以承受的地步,移民原先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强大落差使移民的社会不适感进一步演化成沮丧,形成恶性循环。逻辑关系如图 2 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假设:

H1: 邻县安置的移民在搬迁前的搬迁意愿是影响移民搬迁后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越希望搬迁的人,越倾向于克服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困难,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H2: 移民在搬迁前对搬迁后产生的利益期望,是搬迁意愿与搬迁后社会适应这一因果链条的中介变量。

H3: 移民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对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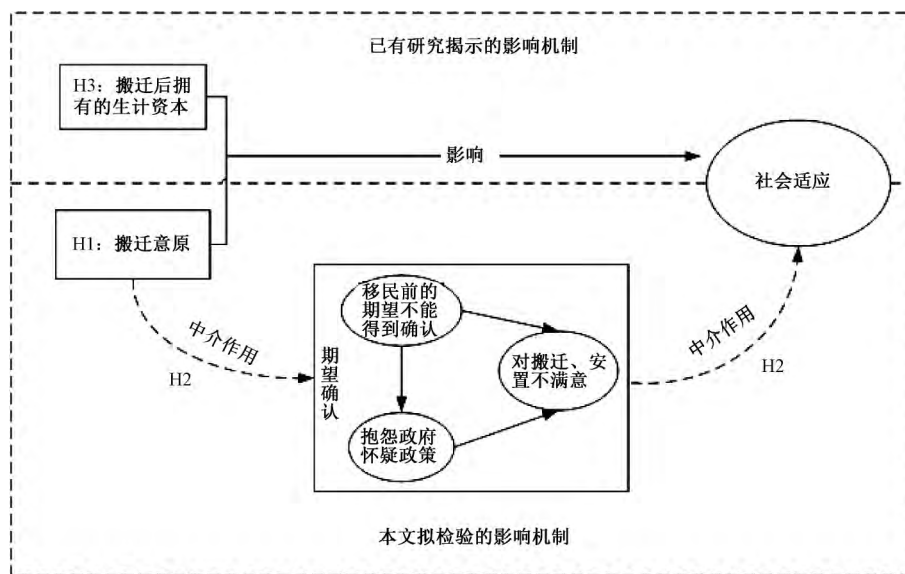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期望确认理论的移民社会适应模型

数据、变量与方法

1、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山西师范大学“黄土高原生态移民”课题组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和吴忠市进行的调查。本次调查的大多数样本户都来自同心、海原、泾源等地。调查共涉及 9 个移民新村,发放 45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32 份。其中中卫市收回 216 份,吴忠市收回 216 份。调查地是回汉民族混聚区,在选择样本时调查人员考虑了民族、搬迁时间等因素,抽样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最终,这些被调查对象当中,平均搬迁年限为 9.61 年($SD=8.06$);回族移民户占 76.1%,汉族移民户占 23.9%;男性为 354 人,女性为 78 人,被试年龄范围分别在 18~60 岁之间($M=41.88$, $SD=24.8$)。

2、变量测量

(1) 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观念、行为方式等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以适应所居住地社会环境的过程。风笑天和王小璐^[45]将移民的社会适应界定为移民在安置地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适应状况和满意程度;解彩霞^[46]把移民的社会适应划分为生产、生活、环境适应等 5 个方面。考虑到宁夏生态移民搬迁距离并不远,搬迁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产和生活的恢复。本文将移民的社会适应主要设定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生活适应水平的测量主要在移民居住条件满意度方面,问题的设置参考了 Visser 等^[47]对于个体生活的综合判断和总的概括认知。设置的生活满意度的测试,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满意度越高心理压力越低,即生活适应程度越好。在选项设置方面按照评价“很好/非常满意”依次递减。生产适应水平的测量主要是农户田间耕作方式、管理形式等方面,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问题,然后运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选项赋值后分别加总求和。社会适应的测量如表 1 所示。

(2) 搬迁意愿

近年来,一些研究自愿-非自愿移民的研究发现,尽管可以依据移民搬迁意愿将移民划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但他们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明显的。自愿搬迁的移民对搬迁补偿能否到位有忧虑,表现出不愿意搬迁的一面;非自愿搬迁的移民也有想改善生活条件,愿意搬迁的一面。本文在现有文献将移民搬迁意愿划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的二分法基础上,依据 Gebre^[48]的分析,将移民的搬迁意愿划分为完全自愿、诱导式自愿、强制性自愿和非自愿四种类型,以细分在当今中国复杂现实背景下移民“愿意”中又“不愿意”,“不愿意”中又“愿意”的微妙心理(如图 3 所示)。

表 1 移民社会适应的测量指标

变量	内涵	指标
生产适应	移民搬迁后农户拥有土地的耕种情况	您对现在生产方面的变化满意么
		搬迁后,您家田间管理改变了么
生活适应	农户对现有居住条件的满意度因素	搬迁后,您家的耕作方式改变了么
		基础设施供应情况(水、电等)
		道路交通状况
		学校设施配备情况
		居民饮食状况
		环境卫生情况
		邻里关系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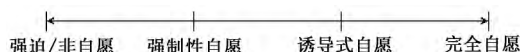


图 3 搬迁意愿的分类

根据图 3 移民搬迁意愿的分类标准,本文将移民搬迁意愿分别从“强迫搬迁、强制性自愿、诱导式自愿和完全自愿”四类进行测量,其中,强制性自愿是指移民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搬,诱导式自愿是指移民受到劝诱而决定搬迁。

(3) 期望确认

在心理学上,期望是指人们盼望得到而尚未满足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行为达到一定目标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之一^[49]。期望的测量始于 1962 年,现有期望的测量多是沿着评价质量或满意度的维度去测量心理期望,这些维度往往是基于政府、企业、社会等提供服务内容的视角而确定的^[50]。本研究认为移民对搬迁的期望确认体现在移民对搬迁前相关政策的了解与搬迁后满意程度的心理比较上,测量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移民期望确认的测量指标

变量	内涵	指标
移民的期望确认	移民搬迁前认为应该达到的条件及搬迁后的实现程度	对搬迁后住房政策了解情况
		对搬迁后医疗看病政策了解情况
		对养老保障政策的了解情况
		对子女教育政策的了解程度
		对产业带动脱贫政策的了解程度
		对买房或建房资金分配了解情况
		对村委会办事态度的满意度
		对村干部办事效率的满意度
		对村委会帮助村民解决问题的满意度
		对政府补偿的满意度

(4) 生计资本

根据生计学者们的研究,生计资本是指家庭所拥有的物质和社会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家庭实施生计策略的能力取决于所拥有的资产状况^[51]。目前,生计资本的测量是根据 Libby 和 Sharp^[51]在非洲开展的关于生计资本的量化研究,这一方法采用加权的综合测量方法,通过将农户纷繁多类的生计资本标准化,分类测量出移民五大类生计资本的指标数值,并加总获得一个可以相互比较的生计资本指标。本文在 Libby 和 Sharp^[51]、李小云等^[52]的研究基础上,依据调查地移民户实际拥有的生计资本种类与数量,设计调查了移民户在搬迁后拥有和能够使用的生计资本,并在标准化后将其全部加总,构建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的生计资本指标。测量资本的数值介于 0~1 之间,数值越接近 1,说明这一类型的资本在样本中的水平越高。具体资本指标的选取及计算如表 3 所示。

3、方法

为了说明移民搬迁自愿程度和家庭富裕程度、社会适应水平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运用方差分析法,检验了 4 类搬迁意愿移民生计资本、适应水平的差异。其次,为了验证本文所提的三个假设,本文使用温忠麟

等^[32, 33]对于中介效应的验证方法,在研究了生计资本、搬迁意愿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情况后,加入期望确认值后再次进行回归分析,考察了期望确认在搬迁意愿与搬迁后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最终得出移民搬迁自愿性、期望确认、生计资本禀赋、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

表 3 移民生计资本指标的构建

资本类型	指标符号	指标	计算公式
自然资本(N)	N1	家庭人均耕地	$N = N1$
金融资本(F)	F1	家庭获得现金借贷的金额	$F = F1 * 0.33 + F2 * 0.66$
	F2	家庭一年的现金收入金额	
人力资本(H)	H1	家庭的劳动力数量	$H = H1 * 0.6 + H2 * 0.2 + H3 * 0.2$
	H2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H3	家庭成员参加培训的次数	
社会资本(S)	S1	家庭成员参与社会组织个数	$S = S1 * 0.5 + S2 * 0.5$
	S2	家庭的借贷网络规模	
物质资本(P)	P1	家庭的房屋结构类型	$P = P1 * 0.6 + P2 * 0.4$
	P2	家庭的大型生产工具	

结 果

1、方差分析结果

4类不同搬迁意愿移民户的生计资本差异和适应水平差异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4类移民户在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在生产适应、生活适应水平上也有显著差异。

表 4 4种类型移民在生计资本和社会适应方面的方差分析结果

	完全自愿(233)	诱导自愿(104)	强制自愿(72)	非自愿(23)	η^2 值	F值
适应水平						
生产适应	2.21(0.44)	2.34(0.60)	2.38(0.42)	2.40(0.49)	0.01	3.61**
生活适应	2.08(0.50)	2.22(0.56)	2.42(0.51)	2.43(0.51)	0.06	10.10***
生计资本						
自然资本	0.28(0.26)	0.23(0.21)	0.24(0.16)	0.34(0.27)	0.01	2.23*
金融资本	0.33(0.18)	0.29(0.16)	0.29(0.22)	0.30(0.18)	0.01	1.53
人力资本	0.45(0.16)	0.40(0.15)	0.41(0.16)	0.41(0.23)	0.02	2.84**
社会资本	0.62(0.28)	0.66(0.26)	0.62(0.28)	0.61(0.26)	0.01	0.64
物质资本	0.53(0.16)	0.53(0.15)	0.53(0.14)	0.49(0.11)	0.01	1.6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 (下同)。

2、回归分析结果

表5检验了生计资本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移民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的影响。首先,在生活适应方面,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系数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次,在生产适应方面,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生产适应的影响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说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影响着移民搬迁后能否快速适应生产方面的变化。这是因为移民在搬迁后,所拥有的土地、流动性资金和生产工具等资本是移民恢复生产的基本要素。

加入移民的搬迁自愿性和其他控制变量后,生计资本对移民户生产、生活适应影响的显著性程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可以看到,移民户搬迁的自愿性与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越愿意搬迁的移民,搬迁后反而越难适应搬迁后的生活。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不一致,可以从心理学的“期望确认”理论来解释,当移民的期望值过高,而实际绩效未超过预期时,移民就容易出现失望和不能适应的状况;反之,搬迁前预期较低,移民面对迁入地的新环境、新设施,会有较高的满意度,从而也有较好的社会适应性^[53, 54]。从移民、政府政策和政府干预的角度出发,分析这一未预期结局发生的原因,即将移民在搬迁前的期望确认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理解移民搬迁自愿性在社会适应性中有负向显著影响的原因。

表 5 移民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生产适应水平			生活适应水平		
生计资本						
自然资本	0.60** (0.09)	0.59** (0.09)	0.33** (0.10)	0.20* (0.12)	0.21* (0.11)	0.28** (0.13)
金融资本	0.25** (0.12)	0.23** (0.12)	0.29 (0.12)	0.25* (0.15)	0.20 (0.15)	0.16 (0.15)
人力资本	-0.10 (0.13)	-0.06 (0.13)	0.05 (0.13)	-0.37** (0.16)	-0.31** (0.16)	-0.28* (0.16)
社会资本	-0.10 (0.08)	-0.11* (0.08)	-0.17** (0.08)	0.13** (0.10)	0.12** (0.09)	0.11** (0.09)
物质资本	0.48** (0.14)	0.45** (0.14)	0.42** (0.13)	0.09 (0.17)	0.02 (0.17)	0.02 (0.17)
自愿性(非自愿)						
完全自愿	-	-0.17** (0.09)	-0.14** (0.09)	-	-0.32*** (0.09)	-0.32*** (0.09)
诱导自愿	-	-0.10 (0.10)	-0.07 (0.10)	-	-0.20* (0.12)	-0.19 (0.12)
强制自愿	-	-0.05 (0.10)	-0.02 (0.10)	-	0.01 (0.12)	0.10 (0.12)
其他因素						
搬迁距离	-	-	0.01 (0.04)	-	-	0.14** (0.05)
搬迁时间(年)	-	-	0.02* (0.00)	-	-	0.01 (0.00)
R ²	0.13	0.15	0.21	0.03	0.09	0.10
F	13.04***	9.06***	11.35***	2.40**	4.96***	4.85***
N	432	432	432	432	432	432

将移民搬迁前的期望确认值加入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发现:移民搬迁前的期望确认值对社会适应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移民的搬迁自愿性与期望确认值则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表 6 加入期望确认变量后移民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期望确认			生产适应水平			生活适应水平		
期望确认	-	-	-	-0.11** (0.01)	-0.11* (0.01)	-0.20** (0.01)	-0.22* (0.01)	-0.22** (0.01)	-0.22* (0.01)
生计资本									
自然资本	-1.21** (0.34)	-1.14** (0.33)	-0.35* (0.36)	0.46** (0.09)	0.47** (0.09)	0.30** (0.10)	0.46** (0.09)	0.45** (0.09)	0.36** (0.10)
金融资本	-0.59 (0.44)	-0.43 (0.43)	-0.13 (0.43)	0.18 (0.11)	0.18 (0.11)	0.18 (0.11)	0.12 (0.12)	0.11 (0.11)	0.13 (0.12)
人力资本	-1.51** (0.48)	-1.24** (0.47)	-0.88* (0.46)	-0.47* (0.12)	-0.47** (0.13)	-0.43** (0.12)	-0.44** (0.13)	-0.44** (0.13)	-0.49* (0.12)
社会资本	0.18 (0.28)	0.09 (0.27)	0.04 (0.27)	-0.03 (0.07)	-0.03 (0.07)	-0.07 (0.07)	0.09 (0.07)	0.10 (0.07)	0.12* (0.07)
物质资本	-2.76** (0.50)	-2.53** (0.49)	-2.53** (0.48)	0.18 (0.13)	0.18 (0.13)	0.17 (0.13)	0.52** (0.13)	0.53** (0.13)	0.54** (0.13)
自愿性									
完全自愿	-	0.88** (0.33)	0.80* (0.33)	-	-0.28* (0.09)	-0.26* (0.09)	-	-0.13 (0.09)	-0.14* (0.09)
诱导自愿	-	0.14 (0.35)	0.14 (0.34)	-	-0.39** (0.09)	-0.27* (0.09)	-	-0.17** (0.09)	-0.18* (0.09)

(续表)

变量	期望确认			生产适应水平			生活适应水平		
强制自愿	-	0.07 (0.37)	0.00 (0.36)	-	-0.05 (0.10)	-0.02 (0.09)	-	0.03 (0.10)	0.01 (0.10)
其他因素									
搬迁距离	-	-	0.48* (0.15)	-	-	0.05 (0.04)	-	-	0.03 (0.04)
搬迁时间(年)			-0.06 (0.01)			0.01* (0.00)			0.01 (0.00)
R ²	0.13	0.18	0.24	0.27	0.27	0.31	0.44	0.45	0.47
F	12.79***	11.92***	13.00**	25.69***	17.18***	16.85***	55.08***	38.99**	33.30***
N	432	432	432	432	432	432	432	432	432

总之,追求发展,愿意搬迁的“邻县安置”型移民在搬迁后出现了失望和不适应的一面,期望并没有得到确认,本文的假设 H1 没有得到验证。

图 4 给出了影响移民搬迁后社会适应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从图 4 中可以看出,移民的自愿性与社会适应为负向显著关系,移民自愿性与期望确认值之间为正向显著关系,期望确认在自愿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有中介效应,本文的假设 H2 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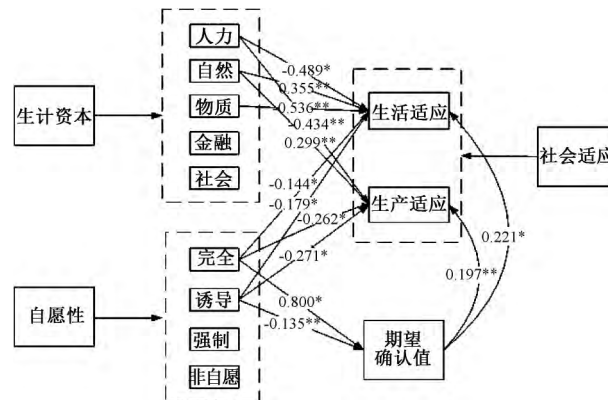


图 4 影响易地邻县安置移民社会适应各因素的路径关系

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生活适应、生产适应都有负向的显著关系,移民的自然资本和生产适应、生活适应都有正向的显著关系,物质资本对生产适应有正向的显著关系,但本文并没有发现其他资本对移民的社会适应有显著关系。本文的假设 H3 获得部分验证。

基于模型的讨论

相比已有易地移民研究,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进展:

其一,大部分已有研究将易地移民的安置方式划分为“远迁”安置和“后靠”安置或“县外”安置和“县内”安置几种类型^[55],这些划分方法忽略了本文所研究的“邻县”安置类型。实际上,易地移民的邻县安置具有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有一定差异,但文化、心理背景相似,社会文化及传统易于被移民接受的优点,在宁夏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实践中经常遇到。本文在邻县安置方面做了拓展研究。

其二,大部分已有研究对移民搬迁意愿的划分使用了“自愿”和“非自愿”的两分法,这类划分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移民的搬迁意愿是复杂的,仅仅划分为“自愿”和“非自愿”是不符合实际的,如非自愿搬迁项目中移民会有“自愿”搬迁的动机,而“自愿”搬迁项目中也会有强制性搬迁的政策实践^[56]。本文将移民的搬迁意愿细化为 4 种类型,是对这一两分法的补充。

其三,大部分已有研究认为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不适应是由于迁“出”“入”两地的不同文化导致移民的原有资本不能发挥作用^[57]。部分研究短距离、同文化圈“后靠”安置移民的文献也只是认为移民不能适应当地社会是由于“分配的土地资源过少”或“补偿过少”之类的资本因素。本文引入了意愿—期望—确认—适应

的逻辑链条,从移民的思想因素出发理解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问题。

在结论上,本文发现移民搬迁前的搬迁意愿对移民搬迁后的生产适应和生活适应有负向的显著性影响。这一发现与本文的假设是相反的,也与已有包括水库移民、生态移民在内的非自愿移民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结论是相反的。本文与已有研究不一致的地方可以用期望确认理论进行解释。

首先,在宁夏易地移民邻县安置中,部分地方政府在鼓励移民搬迁中存在一定的工作方法问题,譬如,有些基层工作人员向准移民宣传时,有夸张和诱导的现象,向他们描述了一些在当前还较难实现的美好前景。在我们对移民访谈时,不止一个访谈对象愤愤不平的向我们抱怨说当时在搬迁前给他们说的搬过来后将会用水方便、用电方便、还会用上暖气,但实际上他们搬过来后,这些都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找谁去兑现这些承诺,感觉当时的基层工作人员骗了他们。类似的承诺加重了移民搬迁前的期望,但在搬迁后却又不能得到确认,因此,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移民的不适应感也会越强。政府的承诺增加了准搬迁户的期望值,移民认为移民工程是国家推进的大工程,期盼能得到更多的好处^[5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移民的期望并不能总得到确认,部分移民搬迁后心理落差较大,产生失望和不满情绪^[59]。

其次,搬迁政策的实施和安置政策的实施分别是由移民的“出”“入”两地基层政府实施的,存在有脱节的现象。有些搬迁地基层政府给移民所做的承诺并没有被安置地基层政府所兑现,加重了移民在搬迁后的失望感。另外,在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靠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私人谈话而实现^[60],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使准移民只能依靠猜测、推断等方法揣测国家的具体政策。譬如说,多数移民也不清楚家庭搬迁后,移民应该享受的房屋补偿具体数额是多少。而且,由于宁夏易地扶贫移民工程时间长、项目种类多,移民家庭所享受的补偿金额随着时代的变化、项目工程的变化也会有较大的变化,这些都给移民造成了很强的心理不平衡感。我们在访谈中就了解到许多老移民对新移民比他们补偿金额高就非常不平衡。安置地基层政府对移民面临的具体问题缺少解决办法,使得原来有高期望值的移民心理有了更大落差感,进一步影响了移民在安置地的社会适应性。

再次,移民自身也有“我为国家那么大的工程做出了贡献,国家就应该管我”的“等(安排)、靠(政府)、要(补助)”思想。宁夏的易地移民大多来自宁南山区,移民在原迁出地生产方式单一,文化水平不高,部分家庭也不想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的移民还成为了“钉子户”^①。经过政府动员后搬家安置到新的地方,但由于个体“人力资本失灵”和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不可能“大包大揽”的现实,部分移民在短时间遇到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这些相同经历或体验的移民在情绪上产生共鸣,相互感染,滋生失望情绪^②;那些原来愿意搬迁的家庭就会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却不管我们,失望与抱怨情绪就会越大,相应的社会适应性也很差。

最后,移民拥有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对其社会适应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因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部分移民在农业生产方面难以适应安置地的生产方式。在宁夏的移民中,较为贫困的家庭主要还是那些缺少劳动力或劳动力缺少技能的家庭,在我们的访谈中,大多数访谈对象表示他们也知道“只靠农业是赚不了钱的,(家庭脱贫)还得靠打工”,但是打工需要多少会些技术,否则会“经常没活儿干”。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专业技能培训和其他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对移民在经济上是否能恢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61][62]}。然而,移民搬迁后政府给予他们较少的技能培训,处于弱势的移民原先的生计资本不能帮助他们利用迁入地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对迁入地的新生计类型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和抵触,其社会适应也较为困难。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邻县安置移民在搬迁后的生产、生活适应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在邻县安置移民中,自愿搬迁移民的生产适应性和生活适应性比强制性搬迁移民的适应性还低。使用移民搬迁前的期望确认作为中介变量并进一步研究发现,移民搬迁前的期望确认在移民的搬迁自愿性对搬迁后生计恢复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第二,邻县安置移民的人力资本对移民搬迁后的生活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移民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

①凤凰资讯“搬出大山谋致富”创扶贫与生态保护双赢。http://news.ifeng.com/a/20141122/42542953_0.shtml。

②网易新闻:坚决破除“等靠要”思想。<http://news.163.com/13/0808/01/95NINQK700014AED.html>。

本在移民生产适应方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虽然建立在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易地移民邻县安置的调查数据基础上,但对于目前我国其他类型的移民搬迁仍有启示:

第一,对于类似“邻县安置”等较短距离的移民搬迁安置,在搬迁前政府应该将新迁入地的优势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告知移民,给予移民合理、符合实际的预期,在政策宣传上不要有对新迁入地生活环境夸大的宣传,制订的搬迁计划要按计划兑现承诺,加强移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搬迁前给予他们合理的预期,搬迁后给予他们良好的政策支持。另外,一线的搬迁组织人员也不要给搬迁户不负责任的承诺,同时尽可能增加对贫困移民户经济上的支持,减少他们搬迁以后因生计方式转换产生的压力,在搬迁后尽快地融入迁入地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第二,在移民搬迁后有计划地开展心理讲座和培训,将一些简单的心理减压方式教给移民,增加移民的心理弹性,帮助移民尽快适应搬迁后的新环境。针对有心理压力或存在心理障碍的移民进行心理援助,引导移民对于存在的或潜在的心理问题进行正确的处理,提升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积极性和自信感。

第三,在整个搬迁过程中要尽可能充实移民的生计资本,譬如保持移民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一般来说,由于现实因素的制约,新迁入地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移民在搬迁过程中不能拿到维持生计的足够土地,土地数量和质量都会降低,搬迁前依靠耕作生活的移民在生计恢复中就会出现困难,如果不能及时转换生计方式,心理压力就会增加。政府需要对移民给予适宜他们转换生计方式的技术培训,并将这种培训转化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在技术培训的同时还要不断培育他们的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各种优惠政策结束时使他们摆脱弱势,走上自立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罗强强. 宁夏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移民扶贫的方法和案例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30(9): 48-51
- [2] Cernea M. M. Risks, Safeguards and Reconstruction: A Model for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0, 22(5): 3659-3678
- [3] Crowe E., Higgins E. T. Regulatory Focus and Strategic Inclinations: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in Decision-mak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7, 69(2): 117-132
- [4] Reed G. M., Kemeny M. E., Taylor S. E., et al. Negative HIV-specific Expectancies and AIDS-related Bereavement as Predictors of Symptom Onset in a Symptomatic HIV-positive Gay Men[J]. Health Psychology, 1999, 18(4): 354-363
- [5] Zhang Q. Post-Pastoralism? Pastoralists Living with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a chapter in Pastoralism in China) [J]. National Policies and Local Practices, 2012, 15(8): 13-17
- [6] 何得桂, 党国英. 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6): 119-123
- [7] Humphrey C., Sneath D.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1996, 35(1): 19-23
- [8] 杨云彦, 赵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3): 58-65
- [9] 冯伟林, 李树茁. 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4): 2-9
- [10] 叶青, 苏海.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5): 64-70
- [11] Kar A., Takeuchi K. Yellow Dust: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Felt Needs[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04, 59(1): 167-187
- [12] 李博, 左停. 遭遇搬迁: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2): 25-31
- [13] 黎洁, 李树茁. 基于态度和认知的西部水源地农村居民类型与生态补偿接受意愿——以西安市周至县为例[J]. 资源科学, 2010, 32(8): 1505-1512
- [14] 李聪, 李树茁, 费尔德曼, 等. 劳动力迁移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0, (6): 20-26
- [15] 左冬梅, 李树茁.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

-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8(2): 93-100
- [16] 李树茁, 杨绪松, 悦中山, 等.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7(1): 67-76
- [17] 陈金明, 吴淑娴. 农村土地流转: 目标、问题与对策[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 30(3): 232-235
- [18] 束锡红, 任志军, 聂君. 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移民社会适应性预测及分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3(3): 102-105
- [19] Banks T.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n Rangeland China: Dilemmas on the Road to the Household Ranch[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12): 2129-2142
- [20] 李树茁, 任义科, 靳小怡, 等.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8, 30(2): 1-8
- [21] 金细簪, 虞晓芬, 胡凤培. 征地拆迁的预期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29(6): 11-17
- [22] 何得桂, 党国英, 杨彦宝.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结构性制约及超越——基于陕南移民搬迁的实证分析[J]. 地方治理研究, 2016, 3(1): 31-45
- [23] 张建军.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中央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总体考虑和政策取向[J]. 中国经贸导刊, 2016, 33(3): 19-20
- [24] 储德平, 伍骏骞, 卫龙宝. 区域分异视角下乡村企业入城意愿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5): 138-146
- [25] 姚琦, 马华维, 乐国安. 期望与绩效的关系: 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J]. 心理学报, 2010, 42(6): 704-714
- [26] 郑丹丹, 雷洪. 三峡移民社会适应中的主观能动性[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33(3): 51-57
- [27] 王丽萍, 曾祥岚. 宁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以杨显村等10个移民点为例[J]. 宁夏社会科学, 2015, 33(3): 60-64
- [28] 叶嘉国, 雷洪. 三峡移民对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对三峡库区移民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00, 20(6): 58-64
- [29] 汪雁, 风笑天, 朱玲怡. 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1, 2(2): 129-136
- [30] 陈绍军, 施国庆. 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03, 3(5): 114-117
- [31] 许汉石, 乐章.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33(10): 100-105
- [32]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33] 温忠麟, 范息涛, 叶宝娟, 等. 从效应量应有的性质看中介效应量的合理性[J]. 心理学报, 2016, 48(4): 435-443
- [34] 耿静. 迁移、社会网络和知识体系建构——四川茂县蓝店坡村震后羌族自发移民的适应性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3(11): 29-33
- [35] 杜发春. 国外生态移民研究述评[J]. 民族研究, 2014, 33(2): 109-120
- [36] 李聪, 柳玮, 黄谦.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4, 36(6): 106-112
- [37] Brooke W., Mark W.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in China: A False Dichotomy? [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15, 25(5): 144-154
- [38] 李聪, 李萍, 韩秀华, 等. 易地移民搬迁对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活动的影响机制——来自陕南地区的证据[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7(1): 64-71
- [39] 孙良顺. 水库移民贫困成因与反贫困策略: 基于文献的讨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8(4): 77-83
- [40] Oliver R. L.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0, 17(4): 460-469
- [41] 王玥, 卢新海. 社区情感依附对房屋征收的影响及其测度[J]. 城市问题, 2015, 44(4): 52-57
- [42] 李丹, 许娟, 付静. 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及其生计策略关系研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1): 51-57
- [43] 丁士军, 张银银, 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6): 25-34
- [44] 黎洁.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9): 44-52
- [45] 风笑天, 王小璐. 我国三峡移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 社会科学研究, 2004, 33(1): 107-111
- [46] 解彩霞. 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基于格尔木市两个移民点的调查[J]. 青海社会科学, 2009, 39(3): 62-66
- [47] Visser M. C., Fletcher A. E., Parr G., et al. A Comparison of Three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s in Subjects with Angina Pectoris: The Sickness Impact Profile, the Nottingham Health Profile, and the Quality of Well Being Scale [J].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1994, 47(8): 472-483
- [48] Gebre Y. Differential Reestablishment of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igrants: The Case of Metekel Settlers in Ethiopia [J].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2 ,84(4) : 1031-1040
- [49] 刘成斌,雷洪. 三峡移民的角色行为障碍[J]. 社会,2001 (8) : 13-16
- [50] 黄忠东. 组织政治行为与职业生涯成功[J]. 华东经济管理,2009 23(10) : 101-104
- [51] Libby L. W. , Sharp J. S. Land-use Compatibility , Change , and Policy at the Rural-urban Fringe: Insights from Social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3 85(5) : 1194-1200
- [52] 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 (4) : 32-39
- [53] 史俊宏. 干旱风险冲击下牧户适应性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 36(7) : 89-95
- [54] 李聪,李树茁,梁义成,等.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2010 , 32(3) : 77-85
- [55] 隋艺. 生态移民迁移的动因分析——以三江源 X 村生态移民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2012 (3) : 71-75
- [56] 覃明兴. 扶贫自愿性移民的迁移决策及主体选择性研究[J]. 南方人口,2007 (4) : 32-38
- [57] 隋艺,陈绍军.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J]. 青海民族研究,2016 27(1) : 77-81
- [58] 覃明兴. 扶贫自愿性移民研究[J]. 求索,2004 (9) : 129-131
- [59] 郭圣乾,张纪伟.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J]. 经济经纬,2013 (3) : 26-30
- [60] 马伟华. 试论吊庄移民工程对回族移民生产、生活观念的影响[J]. 西北人口,2009 30(5) : 102-106
- [61] 李培林,王晓毅. 移民、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宁夏生态移民调研报告[J]. 宁夏社会科学,2013 (3) : 52-60
- [62] 唐丽霞,林志斌,李小云. 谁迁移了——自愿移民的搬迁对象特征和原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5 (4) : 38-43

The Willingness , Expecta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Migrants to be Relocated to Neighboring Counties

Tai Xiujun¹ and Zan Xin²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 Linfen 041000;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s on migration concentrate on the resettlement of involuntary migrants to be relocated far away and attributes the inadaptability of migrants to reasons concerning resource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human capital and interruption of social connection in the new pla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ypes of resettlement of migrants to be relocated to neighboring counties and refines the measurement of migrants' willingness to be relocated.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migrants' expectation before relocation on their social adaptability to life and production after relocation.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a social fitness model with regard to migrants to be relocated to neighboring counties , which is verified by multiple regress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migrants' willingness to be relocated is the major factor that affects their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their expectation before relo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firmation after relocation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ecological migration , social adaptability , expectation